


黄中习◎著

典籍英译标准的 整体论研究

——以《庄子》英译为例

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行为（translation）、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三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中习◎著

典籍英译标准的 整体论研究

——以《庄子》英译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黄中习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17-7960-6

I. ①典… II. ①黄… III. ①古籍—中国—英语—翻
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6945 号

广东金融学院学术文库基金项目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 ——以《庄子》英译为例

撰 著 黄中习
责任编辑 李恒平
项目编辑 孔 凡
审读编辑 姜汉椿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戚亮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960-6/H·530
定 价 5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

我初次知道黄中习的名字是在2005年买了他的著作《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没有想到他在第二年报考苏州大学，成了我的博士生。他在2006年已经四十岁，在我的几个博士生中间是老大哥了，但是他待人亲和，跟他的同学相处特别好。尤其赢得同学赞美的是他的勤学精神，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午夜以后。第三学年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边教书、边写论文，得到他单位的领导马龙海教授、关兴华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通过自己的努力，按时完成了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于2009年6月得到了博士学位。

黄中习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专业方向是典籍英译，民族是壮族，身处广东工作。早在他毕业以前就已经确定自己将来研究的方向——壮族民族史诗以及广东地方戏曲的英译和研究，现在他已经开始实现愿望，进行壮族民间史诗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学生而高兴和自豪，相信他一定会在学术的征程上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他的新著《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修改提高而成，就典籍英译的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

在我国翻译理论界以译介和阐发西方翻译理论盛行的情况下，黄中习引入中国思维模式，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三向动态的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及其对三元要素的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三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三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黄中习构建的整体论研究模式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有三

多维视角的整体理论框架,既包括对原作(及原作者)的忠实性,(关照读者的)译文可读性和译者(翻译的再)创造性。这是中国思维模式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整个框架固然还需要不断修正与完善,但是这个起点是不错的。

以我本人而言,我把教学的重点转向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和国外翻译理论通论两门课程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我对这两门学问总的感觉是: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翻译理论在我国则有步西方后尘、亦步亦趋、以偏盖全之嫌。西方把文化概念引入翻译理论确实是一大进步,摆脱了把翻译看成纯语言问题的桎梏,为认识翻译本质、指导翻译实践开拓了新的视野。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忽视了翻译的根本问题还是语言问题,似乎解决了文化问题就解决了翻译的全部问题;在强调翻译作品受众时似乎又忽视了翻译作品的源语文本。

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诗话性质比较浓,西方的当代翻译理论的逻辑性比较强,两者的有机结合可能会对形成我国的典籍英译理论产生良好的整合效果。我的几个博士的论文正在从不同的出发点、以不同的方法对此目标进行探索。黄中习的新著就体现了这样的探索精神。

是为序。

汪榕培

2010年5月25日

于苏州幽兰斋

前言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桥梁,翻译事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翻译人才培养、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专业的建设及翻译教学的改革得到了社会的日益重视。至今,全国已经有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13 个院校开始试办了翻译本科专业的教育,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40 个院校开始试办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培养。

在当今全球村时代,经济要实现全球化,文化要保存多元化。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努力,广泛传播中华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强音。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着力推进汉语的国际化推广工作,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开展“大中华文化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重大项目,旨在让各国读者更完整、更真实地认识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工作和典籍英译人才的培养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博大精深、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中,56 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各殊,文学异彩纷呈,自有特色,各领风骚。传世的民族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世界罕见。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来进行。当今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得典籍英译工作大有可为。

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两百多年来的典籍英译历史长河中,中国典籍英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二是中国译者。近代以来,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首先是一批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们的典籍英译成果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始于一百多年前,其中辜鸿铭

是国人独立从事典籍英译的第一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人英译的中国典籍数量不大,比较突出的是林语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闭多年的国门又重新开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得以恢复,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目前,国内已经有多种典籍英译丛书相继出版发行。例如,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指导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编译出版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英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目前该工程已经出版了五十余种上百部典籍英译著作,并且多家大型出版社已经加入到典籍英译的出版工作中来,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化。各种强势媒体也在积极参加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与输出,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翻译的最大目的不外乎传神达意,彼此沟通。总体上说,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认知活动、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一种专业的交流工具。译者翻译有原则,翻译批评有准则,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的探讨既是老生常谈,又是新论迭出。就典籍翻译来说,相比于典籍翻译实践的丰硕成果来说,其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尤其是宏观意义上的典籍翻译理论探讨。对当代典籍英译实践的研究,不仅需要翻译进行鉴赏批评式的研究,更需要对典籍英译历史的认真梳理概述,需要宏观的理论探讨。因此,笔者以相当长的篇幅对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标准、《庄子》英译与研究等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述评总结,以史为鉴,以翻译实践和翻译实际为基础,进行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试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继承、结合与创新中进行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研究的总体思路自下而上(bottom up),从典籍英译的实践和实际出发;而不是非从宏大的理论体系出发,自上而下(topdown)地考量翻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典籍英译标准继续进行探索的尝试和努力。

第一章概述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指出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关键词进行界定,介绍本书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

第二章详细概述海内外典籍英译的历程,重点介绍主要译家及其译作情况,对典籍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典籍英译与研究历史发展的四个特点。

第三章综述考察典籍英译译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翻译标准,并简短回顾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的历史和译者论者关于经典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作为典籍英译标准概述和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观探讨的有益参照。

第四章首先指出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笔者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行为(translation)、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三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作者接着审视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标准,认为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就是译者翻译的根本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就是其翻译标准。作者还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三向动态的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及其对三元要素的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三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三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

第五章是“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的个案运用和论证分析。为了全面考察《庄子》英译译者整体翻译标准的中心取向,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的英译历程和《庄子》英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全面的概述,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庄子》译本——理雅各的全译本、汪榕培的全译本、葛瑞汉和莫顿的选译本,以整体论视角来考察译者翻译整体标准及其中心取向的取舍趋势,从多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

笔者尝试融汇中西,打通古今,运用理论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典籍英译译者的自律准则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本质上属于哲理思辨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作者的研究路径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来探讨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本书的个案运用分析表明,“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助于更全面合理地描述、分析和解释典籍英译标准,典籍英译的现象,乃至其他翻译现象。

笔者拟就典籍英译的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

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笔者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的研究模式是翻译标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是一个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有三维视角的整体理论框架,既包括对原作(及原作者)的忠实性,(关照读者的)译文可读性和译者(翻译的再)创造性。笔者期望自己的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能有助于加深对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正确看待和深入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问题,有助于澄清并走出关于典籍英译与研究的一些认识误区,例如典籍的可译性问题,译出典籍的可行性问题,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的关系问题,翻译标准与翻译规范、翻译的描述性研究和规定性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推而论之,这样的典籍英译理论探索和整体论观点有助于正确认识翻译的概念和本质,以及明确翻译研究的中心范畴,有助于改变目前翻译研究的学科概念混淆、学术研究方向杂乱的局面,有助于为翻译研究正本清源,但愿也能有拨乱反正的功效。至于作者努力的得失,有待读者评判,希望专家斧正。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得到了“广东金融学院学术文库”项目资助,得到了学院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谨此感谢。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广大的翻译爱好者。如果笔者对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探索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典籍英译标准,那么本书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黄中习

目录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典籍英译——机遇和挑战	1
1.1 缘起	1
1.2 关键词界定	11
1.3 本书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	22
第二章 典籍英译简史及主要译家概述	27
2.1 典籍英译的范围划分和历史分期	27
2.2 早期和传教士时期海外的典籍英译及主要译家	28
2.3 现当代海外的典籍英译及主要译家	41
2.4 现当代国内的典籍英译及主要译家	54
2.5 典籍英译发展历程的主要特点	63
第三章 典籍英译标准及其整体观探讨的回顾	67
3.1 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及其关注点的回顾	67
3.2 典籍英译标准的概说	82
3.3 先前的翻译标准整体观探讨	96
第四章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	105
4.1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之意义	105
4.2 整体论是翻译标准研究的新路径	108

4.3	翻译之道	116
4.4	翻译标准之道与译者的翻译标准	133
4.5	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和翻译标准	137
4.6	“信顺创”:三元要素中心取向的典籍英译整体标准	141
4.7	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动态发展的圆融整体	151
4.8	典籍英译标准: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	156
第五章 《庄子》英译与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		161
5.1	《庄子》英译历程的概述	161
5.2	《庄子》英译研究成果的概述	177
5.3	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标准: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	208
5.4	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标准: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	224
5.5	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标准: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	244
第六章 结论		261
6.1	研究综评	261
6.2	当代典籍英译的策略选择	267
6.3	本书研究的主要贡献	271
6.4	本书研究的局限和后续研究可拓展的空间	273
参考文献		275
附录:《庄子》英译研究参考电子文献选录		290
后记		291

图表索引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

1. 表 3-1:“信达雅”译法用词对照表	97
2. 图 3-1:翻译标准多元互补图	98
3. 图 4-1:阴阳太极图	108
4. 图 4-2:五行关系图	109
5. 图 4-3:翻译之道圆融整体图	132
6. 图 4-4:典籍英译标准圆融整体图	157
7. 图 4-5:翻译与其他学科交叉图	158
8. 图 4-6:“翻译标准”的“学术关注度”和“用户关注度”图示	159
9. 表 5-1:《庄子》英语全译本简况表	186
10. 表 5-2:《应帝王第七》的倏、忽与浑沌三个帝名翻译用词对比表	211
11. 表 5-3:《庄子》内七篇篇名的译法对比表(除理雅各译文之外)	218
12. 表 5-4:庄子关于安心学道的七个步骤和境界的译法对比表	234
13. 表 5-5:莫顿的《庄子之道》译本中篇章标题的英译表	249

典籍英译

机遇和挑战

1.1 缘起

2005年,在哥德堡游轮造访广州期间,年过八旬的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在参加中山大学举行的“中欧文化接触与交流——纪念高本汉学术研讨会”之际,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他说:“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这其实与1965年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关于汉典籍译出的观点如出一辙。对此,虽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就像对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负面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态度一样。但葛瑞汉和马悦然这两位海外知名汉学家显然不是随口轻率论说翻译,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在典籍英译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中理清思路,就此端正态度,具体分析,大力发展典籍英译事业。

大多数译者的翻译工作都是从外语到母语,国外汉学家的此等观点当然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来说,尤其是当代全球化时代的典籍英译,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本章将概述我国典籍的整理、研究、翻译与出版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辩说当前关于典籍英译的一些认识误区,并界定一些关键词,简介本书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

1.1.1 典籍的整理研究和翻译出版事业硕果累累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在博大精深、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中,56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各殊,文学艺术异彩纷呈,自有特色,各领风骚。在数量上,我国典籍以汉语撰写的典籍为最多,而用满、蒙、藏、壮、彝等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古代经典古籍,当然也是我国的典籍。可以说,我国传世的民族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世界罕见。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就多达2392种,其中计有汉文典籍2282部,其中包括简帛117种,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这些珍贵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整理、保护和翻译这些典籍,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增强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强我国典籍的对外宣传与翻译也是当今多极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现实需求。

我国的典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和《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把民族文化的精华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典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又一个典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文化建设事业,典籍的整理、研究、翻译与出版的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工作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典籍的整理、研究、翻译与出版等方面工作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国学大师季羨林总编的《传世藏书》、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杨伯峻主编的《白话十三经》、顾廷龙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及《中华再造善本》等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丛书就是好例子。除了文史哲典籍外,出土文献、科技类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了高度重视。例如,根据强势媒体报道,少数民族典籍方面,也已整理出版了少数民族典籍3000余种,例如《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少数民族典籍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研究价值和文化遗产意义。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共整理出版典籍图书逾万种,超过现存传世典籍种数的6%,基本的重要典籍大半已经整理出版,而其中的85%为近三十年来整理出版。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1.1.2 典籍英译,成就斐然

改革开放以来,在典籍整理、研究、翻译与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典籍外译(主要是英译)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取得喜人的成就。其实,“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和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之类图书就是当今典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新领域——外向型典籍整理与翻译工作。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均得到长足发展,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正在崛起,其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度与深度走向国门,走向世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及广州亚运会就是好例子。而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就为世界了解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搭建了沟通的重要桥梁。当前,国家和政府非常重视汉语的国际化推广,并制定了积极政策,向世界各地宣传和推广中国语言文化。而宣传和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广汉语,二是靠翻译。基于中西语言的较大差异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有较大困难等现实,翻译是更主要的方式。2007年,为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而举办的“全国典籍英译新作展”大致表明,我国的典籍英译事业有“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学科建设已见成效;探究领域逐渐拓宽,中国译者独领风骚;各界关注影响扩大,典籍英译任重道远”(刘迎春,黄中习,2007:105—106)的特点。同年,中国外文局和中国译协在北京主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很多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呼吁,要将中译外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实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中译外翻译水平,消除中国“文化赤字”,探索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之路,促进我国对外交流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中国典籍英译本也是学习英语不可多得的好材料。中国读者通过汉英对照阅读,感受英语语言的无穷魅力,学习如何通过英语表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也可以由此学习和提高各种体裁文章汉英互译的方法和技巧。典籍英译工作就是采集中西文化精髓,架构古今文明桥梁,意义重大,前途光明。典籍译者可谓大有可为。

1.1.3 关于典籍英译的认识误区

在当前的典籍英译事业形势喜人的情况下,仍需保持清醒头脑。我们既要看到喜人成绩,也要有忧患意识。与我国浩瀚的典籍数量相比,包括典籍英译在内的典籍整理、研究、翻译与出版事业仍有不少困难,也有隐忧。例如,人们对中国典籍英译的认识仍有这样那样的误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6点。

1.1.3.1 关于中国典籍英译的可译性,认识有误区

几千年的中外翻译史足以证明,“可译性”或“翻译是否可能”的讨论只不过是“一堆废话”而已(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2001:57)。尽管如此,在古今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可译性”仍是翻译及翻译理论的主要概念,是翻译的“超级模因”。纽马克曾指出(Newmark, 2006:42):

当今“世纪之交,人们论说翻译,尤其是权威、哲学和文学等重要的但范围有限的经典翻译时,说翻译仍有种种困难——翻译不当,不可译性,翻译的庄重,翻译的痛楚,翻译的背叛,翻译的造作,翻译的复杂性,等等。”

典籍英译也是如此。以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97:7—13)的翻译理论术语说,“可译性”与“源语—目的语”、“对等”、“意译—直译”和“写作即翻译”一起,可谓是典籍英译的“五大超级模因”。它们挥之不去,不断被复制和传播。

我国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种类繁多。汉语又是诗性语言,贵在简洁,行文讲究对偶押韵,有的甚至一韵到底。就是散文小说也讲究声调的抑扬顿挫。很多典籍距今年代久远,其中文意所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训诂解释,见仁见智,见解不一。典籍英译就需要大量的考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才能把握真义,然后以现代英语进行传神达意的翻译。可以说,典籍英译是双重翻译——古今汉语的释译和汉英翻译,以雅各布逊(Jakobson)的话来说,它兼有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的特点,其高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典籍英译的可译性仍不时有人质疑。对此,我国典籍翻译大家杨宪益(1998:82—83)说得好:

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翻译。

这也就是钱锺书所谓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亦是贺麟(1998:44)所谓的“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老子》、《庄子》、《红楼梦》等典籍的多种全译本足以说明,典籍英译的不可译性、中国译者译出典籍的不可行性等确是人们的认识误区。国内外的《老子》英译本上百种,《庄子》全译本有八种。一部《红楼梦》更囊括了诗、词、曲、赋、联、酒令、谜语等各种有汉语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多种外语全译本的问世更能说明这一点。《红楼梦》的翻译史已达200多年,译本总计上百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版本),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等形式。仅据香港岭南大学陈德鸿(Leo, 2003:326)的统计,《红楼梦》共有15种全译外译本,其中日语四种,韩语三种,英语两种。

如今,无论是四书五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联、散文小说、戏曲传奇,还是像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等古典蒙学读物,我国译者都推出了较好的英译本或汉英对照本。因此,可译性不应成为典籍英译的一个绊脚石。当代的外语学者和译者应该学习和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人格品质和学识修养,不畏艰难,博观古今,中外兼修,理直

气壮地参与典籍的英译与研究，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多作贡献。

1.1.3.2 关于中国译者译出典籍的可行性，认识有误区

从翻译的定义及中外翻译史上看，翻译主要是指把外语译成母语，译入是主流。中外都有种种类似马悦然、葛瑞汉等关于中国典籍“对外译出并不成功（胡德香，2006:355）”或不可行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对“中国人不能译出”的三个理由，潘文国（2004:40—43）已经从三十年来国际政治与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出发，对之逐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评，认为：

中国人也可以在汉籍英译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

其实，“以中国典籍英译而论，国外译者质量很不理想的译本不胜枚举，国内译者高质量的译本也屡见不鲜（汪榕培，2007a:135）”。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个评说同样适合于《庄子》的英译。

几十年来，大陆港台三大翻译学术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1951年创刊，2001 停刊）、《译丛》（*Renditions*）和《中国笔会》（*Chinese Pen*）——之中，“80%的译文由本土译者翻译……虽然三大刊物中古籍今文的翻译比例不等，但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一样，有能力给西方读者译介中国文学……从更高的理论层面讲，在世纪之交，正如《圣经》译者关心译出传播基督教文化一样，我们也关心中国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对外输出（Leo, 2003:338—340）”。

当然，英译典籍最理想的方式是外国译者译入或中外合作进行翻译，但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汉语还不是世界上的主流语言，而英语几乎独霸天下，是当今文化交流最高效的“国际共同语”。在目前形势下，要把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进行系统的英译主要还得靠中国译者，应大力提倡中国学者译出中国文化。为此，季羨林、任继愈、杨牧之、汪榕培、潘文国、王宁等知名学者一直在呼吁社会各界对中国典籍英译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贡献，为多元世界的多元文化交流作贡献。

1.1.3.3 关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的关系，认识有误区

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其新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2006）中综述了世界翻译研究近三十年来多重转向，如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全球化转向、后殖民转向、翻译转向、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种种“流星式”的研究转向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年，大有“朝秦而暮楚”、“喜新而厌旧”的味道，其功过暂且不论。我国的翻译研究大多是跟风转向，不少论著言必称国外如何如何，对当代翻译研究新术语捧及惊羨，充满“叛逆、政治、权力、暴力、改写、操控、颠覆、解构、后殖民”等时兴抢眼的新术语，远离我们的翻译实际，闭门造车，高谈阔论，鲜见实践真知。试想，没有自己一家之译本，没有自己一家之译